

社会保险对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的影响研究*

阳义南 贾洪波 展 凯

【摘 要】文章使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的影响。文章采用因子分析法测量个体“安全感”,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保险、预期风险的影响效应,使用 MIMIC 模型剖析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安全感”因子值为 13.9,达最大值的 87.1%,表明被访者的安全感总体较高;(2)社会保险能显著提升“安全感”,社会保险覆盖率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安全感”将上升 0.08 个标准差;预期风险会显著降低被访者“安全感”,预期风险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安全感”下降 0.15 个标准差,说明社会保险还不足以完全化解社会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3)分险种看,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公费医疗、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被访者“安全感”,但职工医保、新农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文章提出对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对策。

【关键词】劳动年龄人口 安全感 风险社会 社会保险 结构方程模型

【作 者】阳义南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洪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展 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一、引 言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拥有更多的“安全感”,中国高度重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民生事业发展。截至 2019 年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 13.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9.67 亿人,失业保险覆盖 2.0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 2.55 亿人^①。2019 年

*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基本科研重大项目培育“民生公共服务提升国民心理收益研究”(编号:ZDPY 2019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数据来自《2019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快报数据》(http://www.mohrss.gov.cn/wap/fw/rssj/202001/t20200121_356933.html)、《2019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http://www.nhsa.gov.cn/art/2020/3/30/art_7_2930.html)。

扶贫、普通教育、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等民生支出分别增长了 11%、8.9%、11%和 9%^①。可见,国家编织的以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安全网在覆盖范围方面日益广泛,在财政投入方面逐步增加,在保障力度方面日益增强。这张安全网能否提升和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民众“安全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检视社会保险制度影响国民“安全感”的难点,为进一步借助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提升国民安全感提供支持。

从检索的文献看,目前绝大多数“安全感”研究是通过构建“安全指数”来测量中国的社会安全、社会治安状况或民众的安全满意度。然而,社会安全不一定等于国民有安全感。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显示,中国的犯罪率低,属于前 30%水平,但国民“安全感”却在后 25%区间,存在“社会安全但国民安全感低”现象。这是由于“安全指数”更偏向客观描述,而“安全感”侧重于个人内心感受。目前真正从个人精神、心理、情感等维度测量国民安全感的研究较少,进一步检验安全感影响因素及其定量效应的实证分析更少(姚本先、汪海彬,2011;曹羽鹤、王坚,2016)。仅有几篇文献检验了社会保险对国民“安全感”的影响,但只涉及农村老年人,或只讨论了医保、养老等单一项目,而且估计系数大多不显著、不稳健(丁建定、童玉林,2014;杨柳、郑振华,2019)。管理学的实证研究相对完善,但关注的是企业组织员工的不安全感,极少关注民众安全感(徐智华、彭剑锋,2017)。由于经验证据尚不充分,使我们对社会保险影响民众心理“安全感”的认知比较有限,对总体及各险种的量化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缺乏客观评判。

二、文献回顾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1943)认为,安全感是指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并编制了由 75 个问题构成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又称为 S-I 问卷。Reber(1985)则认为,安全感是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中国从个人精神、心理、情感等维度测量安全感的研究起步较晚。丛中、安莉娟(2004)认为,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无力感,编制了含有 16 条题目的安全感量表(SQ),并从中提取出“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两个主因子。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采用了他们提出的安全感定义及测量维度。李幕、刘海燕(2012)从生活积极和谐、工作或学习成效、工作或学习动机 3 个维度 17 个指标测量了心理安全感。方圣杰等(2013)用生活满意度、总体幸福感来测量心理确定感,用状态性焦虑、状态性愤怒来测量不安全感,然后使用心理确定感、不安全感来测量民众心理安全感,发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王俊秀(2008)将财产、人身、交通等 7 项安全感转变为标

^① 《2019 年全国财政账本释放了哪些信号》,《光明日报》(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1/content_5477078.htm),2020 年 2 月 11 日。

准分数再求和得到总体安全感,发现安全感受社会稳定性、社会治安等社会因素、生活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杨菁、杨梦婷(2016)将安全感视为主观认知概念的潜变量,把安全感拆分为归属感、安全需要、确定控制感3个二阶因子进行测量,进而探讨政府与媒体应对、危机事件、群体应急、个体应急4种因素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的影响。总体上,目前评估或测量安全感的相对较多,但探究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关键影响机制的研究偏少(姚本先、汪海彬,2011;曹羽鹤、王坚,2016)。

在众多“安全感”影响因素或机制中,社会保险通过分散或消除劳动者在年老、工伤、疾病、失业等方面的风险,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是提升其安全预期不可替代的手段,被誉为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安全网”、“减震器”(郑功成,2004)。它能弥补工业化与城市化形成的技术、市场、环境等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养老保险可以为退休职工提供稳定收入来源,防止老年贫困(World Bank, 1994)。失业保险可以抵减新技术造成摩擦性失业对家庭的冲击,医疗保险可以减轻化学污染、食品安全、传染疾病等环境风险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曲绍旭,2013)。社会保险制度是提升中国国民“安全感”的支柱性力量和最重要保障机制(青连斌,2018)。

目前直接检验社会保险影响“安全感”的实证研究较少。Pacelli等(2008)的研究表明,失业津贴水平能显著提高私营企业中短期合同职工的安全感。van Oorschot等(2015)的研究显示,社会保障支出每上升1个标准差,民众的不安全感就会降低0.448个标准差,其中就业不安全感降低0.359个标准差,收入不安全感降低0.339个标准差。夏春(2013)初步检验了是否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经济、人际、社会、环境、生存、整体6种不安全感的影响,但有3个回归系数不显著,2个只在10%水平显著,1个在5%水平显著。罗静、沙治慧(2014)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910份问卷的调查显示,有43%对社会保障治理社会风险的评价为满意,57%为一般、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丁建定、童玉林(2014)探讨了是否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养老安全感的影响,养老保险的估计系数只在10%水平显著,而医疗保险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杨柳、郑振华(2019)在研究收入对农民工安全感的影响时,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影响在10%或5%水平显著为正。这几项实证研究只针对部分人群、少量项目、单一风险,并且系数估计结果缺乏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

总的来看,目前关于中国社会保险能否提升国民安全感,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安全感的经验证据仍不充分、不兼备。鉴于此,本文聚焦劳动年龄人口的安全感。已有文献或测量“安全感”,或实证检验安全感影响因素,二者是分开的。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安全感”的测量与统计分析同步进行,且使用多个指标更全面地测量“安全感”,减少测量误差;已有研究只考察个别人群、少量项目、单一风险,本文将同时考察养老、医疗、失业、工伤4个主要社会保险项目,以及失业、犯罪侵害、恐怖袭击、假药伪劣食

品、传染疾病 5 种预期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调查数据。该调查向被访者询问了安全感、参加社会保险情况、5 年内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等问题,并采用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份 21 086 个个体,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对象为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二）变量选择

1. 安全感。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问卷向被访者询问了“过去一周里,您出现以下情况的频率”。每种情况的回答选项为:几乎一直有、常有、少有、没有或基本没有,可设置取值为 1、2、3、4 的有序分类型变量。经过前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选择相关系数在 0.7 以上的 4 个指标(感到恐惧、感到孤独、感到忧愁、感到人们不友好)来测量因子“安全感”,作为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因子模型为:

$$Y=\Lambda_y\eta+\varepsilon \tag{1}$$

式(1)中,由感到害怕 y_1 、感到孤独 y_2 、感到忧愁 y_3 、感到人们不友好 y_4 4 个指标向量 Y 测量出一个因子“安全感” η 。

2. 社会保险。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包含被访者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本文设置基本医疗保险(medical_yes)、基本养老保险(pension_yes)、失业保险(job)、工伤保险(harm)4 个反映社会保险状况的虚拟变量(取值 0、1)。由这 4 个变量合成一个潜变量社会保险,检验其对被访劳动者“安全感”的总体影响。

3. 预期风险。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问卷向被访者询问“未来 5 年,您遭遇以下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包括失业、犯罪侵害、恐怖袭击、假药或伪劣食品、传染病”。这 5 种风险事件的回答选项为:可能性非常小、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非常大,可设置取值为 1、2、3、4 的 5 个有序分类型变量。失业是与就业相关、直接影响家庭经济安全的个人风险,但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周期衰退、技术和结构调整、季节因素、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外部因素造成的(Rejda 等,2014)。犯罪侵害、恐怖袭击、假药或伪劣食品、传染病等是由于他人的行为或不作为带来的损失,属于外部社会风险。由这 5 个变量合成一个潜变量预期风险,检验其对被访劳动者“安全感”的总体影响。

本文的主要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4 个“安全感”测量指标的均值均较高,反映出被调查劳动者的安全感水平较高。4 项社会保险中,医保的覆盖率最高,达到 90%(职工医保占 14.92%、居民医保占 10.68%、新农合占 60.82%,公费医疗占 3.26%),没有医保的占 10%;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为 61%(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

表 1 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感到恐惧(fear)	21057	3.75	0.560	1	4
感到孤独(lonely)	21057	3.69	0.630	1	4
感到忧愁(sad)	21057	3.62	0.660	1	4
感到人们不友好(friend)	21057	3.74	0.540	1	4
基本医疗保险(medical_yes)	20734	0.90	0.300	0	1
基本养老保险(pension_yes)	20667	0.61	0.490	0	1
失业保险(job)	20744	0.11	0.320	0	1
工伤保险(harm)	20755	0.13	0.330	0	1
失业风险(risk_job)	15746	1.58	0.940	1	4
犯罪侵害风险(risk_crime)	16805	1.17	0.442	1	4
传染病风险(risk_ill)	16591	1.25	0.548	1	4
食品药品风险(risk_food)	20626	1.50	0.822	1	4
恐怖袭击风险(risk_te)	20696	1.13	0.377	1	4

占 5.39%、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占 9.45%、居民养老保险占 9.89%、新农保占 35.76%),而没有养老保险的占 39%。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较低,分别为 11%、13%。5 个风险测量指标的取值均比较低,说明被访者预期这些社会风险的发生概率较低。其中,预期发生概率

最高的是失业、食品药品、传染病等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风险,而认为遭遇犯罪侵害、恐怖袭击风险的发生概率最低。

(三) 实证模型

1. 结构方程模型。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整体上检验社会保险、预期风险对被访劳动者“安全感”的总体影响。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对潜变量之间假设关系进行验证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Acock,2013;何晓群,2015)。本文的潜变量为:安全感 η 、社会保险 ξ_1 和预期风险 ξ_2 。预期风险、社会保险影响安全感的结构方程模型矩阵方程为:

$$\eta=\gamma_1\xi_1+\gamma_2\xi_2+\zeta \tag{2}$$

式(2)中,被解释潜变量是“安全感” η 。基本医疗保险 x_1 、基本养老保险 x_2 、失业保险 x_3 、工伤保险 x_4 共同合成一个潜变量社会保险 ξ_1 。失业风险 x_5 、犯罪侵害风险 x_6 、传染病风险 x_7 、药品食品风险 x_8 、恐怖袭击风险 x_9 往往独立发生,共同合成一个潜变量预期风险 ξ_2 。即内生变量安全感是反映型潜变量,社会保险、预期风险则是合成型潜变量。合成型潜变量在社会科学中较常见,是多个测量指标的加权组合,由这些指标共同决定潜变量水平,在统计上对应使用主成分分析构造的指数(Acock,2013;王孟成,2014)。养老、医疗等多个险种共同构成一个人拥有的社会保险,失业、犯罪侵害、传染疾病等多种风险共同构成一个人面临的预期风险,故而使用合成型潜变量更为合适。基于理论分析和逻辑判断,预期风险对安全感的影响系数应为负,社会保险对安全感的影响系数应为正。但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ζ 为预测误差。

2. MIMIC 模型。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医疗保险包括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公费医疗。为考察这种“碎片化”制度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设置了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费医疗 4 个虚拟变量(取值 0、1);设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职工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 4 个虚拟变量(取值 0、1)。借助这 8 个虚拟变量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各自影响。本文使用多指标多因素模型(MIMIC),该模型的解释变量与传统回归模型一样,仍使用显变量(方程右侧),但其被解释变量是由式(1)因子分析测量出来的潜变量安全感。由于使用潜变量,能减少对研究对象的测量误差(Acock, 2013; StataCorp, 2017)。具体公式为:

$$\eta_i = \alpha_0 + \alpha_1 unemployed_i + \alpha_2 harm_i + \beta_1 P_i + \beta_2 M_i + \beta_3 R_i + \Gamma Z_i + \zeta_i \quad (3)$$

式(3)中,被解释变量 η_i 为潜变量“安全感”。 $unemployed_i$ 为失业保险的虚拟变量, $harm_i$ 为工伤保险的虚拟变量。 P_i 是由 4 个养老保险类型的虚拟变量构成的向量, M_i 是由 4 个医疗保险类型的虚拟变量构成的向量。由于这些险种均为虚拟变量,其估计系数的参照对象是那些在 10 个险种均取 0,即没有任何保险的被访劳动者。 R_i 是 5 种预期风险构成的向量, Z_i 为控制变量向量。本文加入年龄、性别、学历、婚姻、户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来检验估计结果是否稳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安全感”的因子模型测量结果

1. 因子分析的先行检验。对测量被解释变量“安全感”的 4 个指标变量进行 Bartlett 检验、KMO 检验、Cronbach 信度检验等必须先行检验,才能确定可否采用因子分析(StataCorp, 2017)。Bartlett 检验 $\chi^2(6)=31572.96$, p 值为 0.000,拒绝了各指标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KMO 检验值为 0.814, Cronbach 信度检验系数为 0.83。这 3 项检验结果说明可以使用这 4 个指标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在先行检验获得通过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确定这一组指标所能测量出的因子个数。传统的主成分分析法(pcf)假设各个指标不存在自己的独特方差,这并不符合现实^①(Acock, 2013; 王孟成, 2014; StataCorp, 2017)。本文分别使用主轴因子法(pf)和迭代主轴因子法(ipf)来检验这 4 个指标是否在测量唯一的公因子——安全感。估计结果显示,主轴因子法 pf 、迭代主轴因子法 ipf 得到的 4 个因子中,都只有因子 1 的特征值大于 1(分别为 2.13、2.28),可以保留。这说明 4 个指标变量确实只能测度出唯一的一个公因子安全感。

2. 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继续对整个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分析,具体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命令 `sem`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中拟合指标 R^2 、CFI、TLI 的值显示,本文

^① 估计结果表明,本文 4 个指标的独特方差值分别为 0.46、0.38、0.35、0.45。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估计结果(N=21057)

测量指标	非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感到忧愁	1.000(.)	0.722*** (172.54)
感到恐惧	0.836*** (92.63)	0.712*** (166.60)
感到孤独	1.047*** (99.82)	0.792*** (216.99)
感到人们不友好	0.884*** (97.06)	0.770*** (202.62)
拟合指标	R ² =0.84 CFI=0.998 TLI=0.993 SRMR=0.007 RMSEA=0.042 ρ =0.852	

注:括号内数据为z值;感到忧愁被程序自动设为1,(.)表示空值。***表示0.1%水平显著。

所构建因子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SRMR、RMSEA值也说明假设的理论模型与真实模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4个指标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0.7,属于高度相关,且在0.1%水平显著。其信度系数 ρ 超过了能接受的标准0.7(Kline, 2000)。这些结果说明整个因子模型及载荷系数均显著,故本文使用的

“安全感”测量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可用于后续的测量和实证研究。

3. “安全感”测量值。根据表2计算得到“安全感”的因子值为13.93,达到取值范围最大值16的87.1%^①。由此可见,被访者的安全感均较高。本文还计算了各省的“安全感”因子值。为具有可比性,根据表2中的标准化系数计算得到的安全感预测值,并使用功效系数法转换为100分制^②(见表3)。

表3中的“安全感”值是使用功效系数法得到的标准化值,取值60~100,只用于按功效系数得分的高低来排序。全国平均值96.07,被调查的29个省份中,高于全国平均值的有14个,低于全国平均值的有15个。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排名靠前的省份全部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例如,2017年,浙江省政府在“建设平安浙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2016年浙江的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6.43%,创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连续13年排名全国前列^③。排名靠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见表3)。

(二)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测量出潜变量“安全感”之后,本文进一步基于式(2)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保险、预期风险对“安全感”的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为极大似然估计(ML),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拟合指标看,CFI、TLI、RMSEA、SRMR的值均在临界标准值的范围之内,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接受。

表4模型1中,由5项风险合成的潜变量预期风险对安全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预期风险越大,被访劳动者的安全感越低。具体的回归系数为-0.049,表明预期风险每上升1个单位,被访者的安全感将下降4.9%。由4项保险合成的潜变量社会保险整体上对安全感产生了1%水平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保险的覆盖率越高,即拥有

① 加权因子值的取值范围为(4,16)。
② 100分制功效系数计算公式为:(预测值-预测值最小值)÷(预测值最大值-预测值最小值)×40+60。
③ 《浙江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13年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新闻网(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1704/20170408_3430879.shtml),2017年4月8日。

的社会保险越多,劳动者的安全感相应就越强。具体的回归系数为 0.068,表明社会保险覆盖率每上升 1 个单位,安全感将提升 6.8%。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风险出现了广泛性和联动性特征,社会成员的危机感明显提高,并呈普遍化倾向。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等成为各年龄段劳动者的焦虑。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养老保险能在职工退休后为其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医疗保险能为劳动者患病补偿医疗费

表 3 中国各省“安全感”的测量(N=21057)

地 区	预测因子值	排序	地 区	预测因子值	排序
浙 江	97.77	1	湖 北	96	16
天 津	97.54	2	陕 西	95.9	17
上 海	97.47	3	山 西	95.77	18
广 东	96.77	4	贵 州	95.74	19
山 东	96.75	5	广 西	95.55	20
福 建	96.68	6	江 西	95.52	21
江 苏	96.64	7	黑龙江	95.2	22
北 京	96.59	8	甘 肃	95.2	23
河 北	96.48	9	湖 南	95.14	24
云 南	96.28	10	内 蒙 古	95	25
吉 林	96.24	11	新 疆	94.95	26
宁 夏	96.15	12	青 海	94.87	27
重 庆	96.11	13	安 徽	94.85	28
河 南	96.09	14	四 川	94.5	29
辽 宁	96.01	15	全 国	96.07	

用支出、促使患病劳动者及时就医,失业保险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津贴和专业训练、职业介绍等服务,工伤保险则为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遭受意外伤害或职业病提供医疗救治,补偿康复费用,并保障基本生活费用。这些经济补偿及相关服务对降低劳动者收入损失、健康损害、贫困等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比表 4 模型 2 中二者的标准化估计系数(0.08 和 -0.149)可知,预期风险对安全感的影响比社会保险大。这说明尽管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能够起到提升劳动者“安全感”的作用,但仍不足以完全抵消失业、犯罪侵害、传染病等社会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这是由于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于工业社会,主要化解与就业关联的、因劳动者劳动能力暂时或永久丧失、失业、或因老龄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遭遇的收入中断或丧失等经济风险(彭宅文,2016)。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风险时代,人为风险占据主导地位,如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这种大灾难,还包括食物、药品、犯罪侵害、传染病、恐怖袭击等会对人们个体产生威胁的外部风险(Giddens,2000)。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社会保险在应对这些新社会风险时总是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白维军、韩羚,2017)。这说明中国既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织密扎牢社会保险安全网,也要在传统社会保险政策的基础上做出制度创新和手段更新,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风险分散机制,才能更充分、有效地抵御预期社会风险的侵害,保障和提升劳动者“安全感”。

(三) MIMIC 模型估计结果

考虑到缺失值的影响(被访者共有 21 086 个,使用 ML 法删除缺失值后只有 12 891 个),式(3)的 MIMIC 模型使用了一种完全信息估计法——保留缺失值极大似然估计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N=12891)

变 量	模型 1 (非标准系数)	模型 2 (标准系数)
结构模型		
社会保险	0.068*** (2.98)	0.080*** (9.70)
预期风险	-0.049** (-2.31)	-0.149** (-13.89)
安全感测量模型		
感到忧愁	1.000(.)	0.716*** (76.94)
常数(截距)	3.811*** (176.83)	5.978*** (81.34)
感到恐惧	0.809*** (43.63)	0.701*** (66.52)
常数(截距)	3.907*** (225.44)	7.420*** (70.92)
感到孤独	1.045*** (57.12)	0.793*** (92.09)
常数(截距)	3.890*** (175.20)	6.465*** (72.64)
感到不友好	0.871*** (43.58)	0.768*** (79.15)
常数(截距)	3.913*** (211.15)	7.557*** (71.60)
合成型潜变量测量模型		
社会保险(Security)		
失业保险	1.000(.)	0.608*** (3.12)
医疗保险	0.174(0.75)	0.097(0.77)
养老保险	0.112(0.74)	0.102(0.80)
工伤保险	0.601(1.20)	0.384*(1.94)
预期风险(Risk)		
恐怖袭击风险	1.000(.)	0.280** (2.36)
犯罪侵害风险	0.591(1.02)	0.187(1.59)
失业风险	0.868** (2.22)	0.570** (8.39)
传染疾病风险	0.634(1.50)	0.244** (2.67)
食品药品风险	0.124(0.81)	0.070(0.84)
拟合指标 R ² =0.027 CFI=0.99 TLI=0.985 RMSEA=0.02 SRMR=0.008		

注:感到忧愁、失业保险、恐怖袭击风险 3 个指标的载荷系数被自动设为 1。括号内数据为 z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

与过去劳保医疗的不缴费、保全家、高水平相比,当前的职工医保需要缴费(单位和职工合计8%)、报销比例更低、不保家庭成员,未能显著提高职工的安全感。有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公费医疗均显著正向地提高了被访劳动者的“安全感”,尤其是居民医保、公费医疗对安全感的影响系数均在 1%水平显著。居民医保解除了过去没有医保看病完全自费的极大风险,且参加医保还有财政补贴(这里是劳动年龄的居民)。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变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公费医疗不需要缴费,且报销比例高、保障范围广。

(MLMV)。MLMV 估计不会删除有缺失的观测值,而是根据数据完整性(缺失)的类型,提出修正的对数似然函数^①,来实现基于全部样本观测值的极大似然估计(易丹辉,2008;Acock,2013;王孟成,2014)。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4 中使用 ML 估计删除缺失值后,只剩下 12 891 个观测值,而使用 MLMV 这种完全信息参数估计法,表 5 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最终使用观测值为 21 071、21 073 和 21 086 个,这样就能更充分地提取出样本中所含的总体信息,提高统计推断质量(何晓群,2015)。

从表 5 模型 3 的估计结果看,与没有保险的被访劳动者相比,有职工医保对安全感的影响不显著。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从过去的单位劳保医疗改革而来。

① 修正的对数似然函数见易丹辉(2008)的研究。

从估计系数来看，公费医疗的回归系数最大(0.066)，其次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最低为职工医保。

在各项养老保险的估计系数中，相比没有保险的被访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均在 1% 水平显著提高了拥有者的安全感。其中，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系数最大(0.1)，其次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最后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国职工养老保险金连续 15 年上涨，目前全国平均为 2768 元/月，比 2005 年的 738 元上涨了 3.8 倍，且每年定期调整、按时足额发放。这些举措对提升职工安全感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新农保”对安全感的影响系数不显著。2019 年国家规定的

表 5 MIMIC 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方法	mlmv+robust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社会保险			
职工医疗保险	0.019(1.21)	0.024(1.54)	0.011(0.68)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038*** (2.68)	0.043*** (2.98)	0.027* (1.89)
农村合作医疗	0.021* (1.82)	0.014(1.25)	0.021* (1.84)
公费医疗	0.066*** (3.59)	0.060*** (3.31)	0.040** (2.16)
退休金(机关事业单位)	0.084*** (5.48)	0.066*** (4.33)	0.071*** (4.49)
职工养老保险	0.100*** (7.39)	0.093*** (6.96)	0.100*** (7.20)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0.052*** (4.12)	0.047*** (3.78)	0.055*** (4.24)
农村养老保险	-0.005(-0.65)	-0.015**(-1.99)	0.004(0.56)
失业保险	-0.015(-0.94)	-0.007(-0.43)	-0.016(-0.99)
工伤保险	0.023(1.55)	0.027*(1.80)	-0.009(-0.59)
预期风险			
失业风险		-0.036***(-8.13)	-0.037***(-8.30)
犯罪侵害风险		-0.031**(-2.10)	-0.029**(-1.99)
传染病风险		-0.030***(-3.29)	-0.033***(-3.69)
药品食品风险		-0.010*(-1.81)	-0.018***(-3.38)
恐怖袭击风险		-0.037**(-2.16)	-0.035**(-2.07)
控制变量			
年龄			-0.012***(-7.89)
年龄平方			0.000*** (6.48)
性别(男=1)			0.037*** (5.87)
大学学历			-0.005(-0.48)
已婚			0.094*** (8.16)
户籍(城镇=1)			0.012(1.29)
收入(对数)			-0.027***(-4.88)
收入平方			0.003*** (7.79)
测量模型			
感到恐惧	1.000	1.000	1.000
常数	3.709*** (339.36)	3.905*** (240.56)	4.049*** (123.30)
感到孤独	1.253*** (57.79)	1.252*** (57.90)	1.255*** (57.67)
常数	3.639*** (270.75)	3.884*** (192.71)	4.066*** (98.82)
感到忧愁	1.198*** (59.21)	1.199*** (59.16)	1.201*** (59.04)
常数	3.572*** (276.11)	3.808*** (194.85)	3.981*** (100.53)
感到不友好	1.058*** (53.30)	1.058*** (53.42)	1.057*** (53.37)
常数	3.701*** (322.41)	3.909*** (229.15)	4.061*** (117.44)
拟合指标			
N	21071	21073	21086
RMSEA	0.013	0.017	0.02
CFI	0.996	0.99	0.979
SRMR	0.006	0.007	0.007
R ²	0.011	0.033	0.057

注：感到恐惧的载荷系数被自动设为 1；括号内数据为 z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显著。

“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88元/月。这个养老金水平还很难起到提升“安全感”的作用。

表5中,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劳动年龄人口而言,失业风险、工伤风险与就业、工作关联更为紧密。失业、工伤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中断,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目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2019年底仍只保障2.05亿和2.55亿人。在被访者中,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11%、13%。两险的保障水平和保障内容也更不完善,属于社会保险体系中发展相对滞后的险种,是中国社会保险影响安全感的“短板”。可见,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应是未来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需要着重关注的部分,能相对更高地提升“安全感”边际效应。

模型4、模型5中,失业风险、犯罪侵害风险、传染病风险等5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影响效应保持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聚焦检视社会保险制度对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预期风险会对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产生负面影响,社会保险则会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安全感”,但目前社会保险还只能抵消约53%的由预期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2)分险种看,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公费医疗、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参加者的安全感,但职工医保、新农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方面由于部分社会保险项目的覆盖面缺口和保障水平偏低,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保险制度瞄准的主要是失业、患病、工伤等造成的收入损失风险。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福利国家的产物,是基于工业社会产生来应对外部风险或系统风险的线性制度安排,对更复杂和难以应付的犯罪侵害、传染病、食品药品、恐怖袭击等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的抵御作用有限。因此,以社会保险这种工业化的产物来应对风险社会下的安全(安全感)需要在理论上或逻辑上实现更好的超越。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提升劳动者“安全感”的正向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继续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持续提高覆盖面、给付水平,增强财务稳健性、制度可持续性等,尤其要重点完善职工医保、新农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未能有效提升劳动者安全感的明显短板。(2)增加社会保险的弹性和适应流动性以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保护,逐步把重心从以前注重事后补救的社会保险保障方式转向兼顾事后补救和事前预防,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应急管理机制以应对突发的危机事件。(3)树立大安全观,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与社会保险制度平行或起弥补作用的多层次社会风险分散机制,完善包括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就业、自然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全方位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安全需要。

参考文献:

1. 白维军、韩羚(2017):《社会保障新风险及公共服务治理回应:基于新社会风险的视角》,《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
2. 曹羽鹤、王坚(2016):《安全感研究述评与展望》,《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12期。
3. 丛中、安莉娟(2004):《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2期。
4. 丁建定、童玉林(2014):《社会支持来源、社会保障与农村老年人养老安全感》,《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5期。
5. 方圣杰等(2013):《一般社会民众心理安全感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杂志》,第7期。
6. 何晓群编著(2015):《多元统计分析》(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李幕、刘海燕(2012):《心理安全感作用问卷的编制》,《求实》,第S1期。
8. 罗静、沙治慧(2014):《社会保障治理社会风险的效用研究——基于治理满意度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第4期。
9. 彭宅文(2016):《专栏导语: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改革》,《公共行政评论》,第4期。
10. 青连斌(2018):《中国民众的安全感来自哪里》,《人民论坛》,第10期。
11. 曲绍旭(2013):《社会风险视域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第5期。
12. 徐智华、彭剑锋(2017):《心理安全研究述评及展望》,《现代管理科学》,第4期。
13. 王俊秀(2008):《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社会》,第4期。
14. 王孟成(2014):《潜变量建模与 Mplus 应用·基础篇》,重庆大学出版社。
15. 杨柳、郑振华(2019):《收入越高农民工越有安全感吗——政策敏感度视角下的群体分化特征研究》,《财经科学》,第3期。
16. 杨菁、杨梦婷(2016):《重大突发事件中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基于4·20雅安地震公众安全感的实证分析》,《探索》,第1期。
17. 姚本先、汪海彬(2011):《整合视角下安全感概念的探究》,《江淮论坛》,第5期。
18. 易丹辉编著(2008):《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郑功成(2004):《中国民生的两大主题: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理论探讨》,第5期。
20. Acock, A.C. (2013), *Discover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Using Stata*. A Stata Press Publication.
21. Devicienti, F., Maida, A., Morini, M., Poggi, A. and Vesan, P. (2008),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Employabili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Flexicurity Debate*. Dublin: European Foundation.
22. Giddens, A. (2000),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3. Maslow, A.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4): 370-396.
24. Reber, A.S. (1985),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Penguin Books Ltd.
25. van Oorschot, W. and Chung, H. (2015), *Feelings of Dual-insecurity among European Worke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1(1): 23-37.
26. World Bank (1994),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